



《新喜剧之王》： 困境与突破

赵卫防

2019的春节档电影,面向未来的科幻类型电影营造出了滔天巨浪,在这股巨浪的呼啸中,其他一些影片显得较为弱势,周星驰电影《新喜剧之王》便是其中之一。的确,在内地的现实语境中,周星驰电影的创作,特别是其偏写实风格的作品越来越面临困境,但从《新喜剧之王》中,观众亦能感受到周星驰在困境中为保持这种风格做出的艰辛努力。

周星驰电影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新世纪之前的经典时期和“北上”之后的调整时期。其经典时期主要是指《喜剧之王》(1999)之前的影片,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始终致力于这样的主题展示:一是表现草根阶层小人物的忍辱与奋斗,并由此表现黑暗世界中人性的复杂性,佐之对人性的阴暗面的批判与悲悯,进而颂扬幽暗中的人性之美。二是尽力展示草根世界中悲悯的爱情,演绎黑暗庞杂世界中的童话故事,总想在黑暗的世界中给观众一束亮光。三是竭力呈现香港现实社会中的市井民生,以本土性来接地气,赢得香港观众的欢迎。在具体的美学手段上,经典时期的周星驰电影保持了解构、颠覆经典和传统的惯性,具有某些后现代主义的表层特质,也因此凸显了无厘头喜剧的类型特征。然而,周星驰对经典和传统的解构、颠覆,最终仍然回到颂扬真善美的经典主题,落到讽刺人性之恶、讴歌人性之美的传统价值观。也就是说,周星驰电影中,颠覆传统是回归传统的途径,解构经典是重建经典的手段。

新世纪之后,随着香港电影生态的恶化,香港电影开始大规模的“北上”,周星驰也开启了和内地影坛的合作之路。周星驰电影从《少林足球》(2001)开始,在延续其经典时期美学之魂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调整。在内容层面,《少林足球》之后的文本延续了表现小人物、展现悲悯爱情两个层面,而表现香港市民生活的本土性渐渐消失。在表现形式上,其无厘头喜剧的类型特征一直延续,但从《少林足球》开始的一系列作品如《功夫》(2004)、《长江七号》(2007)、《西游·降魔篇》(2013)、《美人鱼》(2016)、《西游·伏妖篇》(2017)等走奇幻路线,利用高科技手段来营造视听冲击,创造出既非香港空间也非内地空间的奇幻世界。这种转变,应该是周星驰在“北上”语境下为迎合更为广泛的华语电影市场做出的扬长避短的艺术调整:“北上”之后,过重的香港本土性已经不再适宜表现,而内地的草根阶层生活他又不熟悉;所以避开本土性而选择华语地区观众都能接受的以高科技手段营造出的奇幻世界,是较为明智的选择。从周星驰艺术调整之后的文本来看,他这种改变是成功的,甚至比以往作品有了美学超越。

至《新喜剧之王》,周星驰的这种美学努力依然,但该片却不同于他“北上”之后的其他文本。首先,《新喜剧之王》不同于《少林足球》之后的其他奇幻题材影片,而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表现小人物艰辛的现实题材影片,在

片中不可能进行高科技手段的奇幻空间营造。其次,这部影片的视点对准的是内地,不能像前IP《喜剧之王》和其他经典时期的作品那样,将香港本土化表现搬演过来,而必须表现出周星驰所不熟悉的内地草根阶层,需要在内地空间中展现草根情怀,这对周星驰来说是一次较大的挑战。第三,在离开香港本土氛围、离开奇幻世界的状况下,仍要在作品中营造出无厘头风格来,这也需要非凡的艺术智慧。鉴于这些困境,周星驰需要做出调整,更艰难的美学努力。

这种努力的首要方面,表现为影片依然以对小人物的关照获得了周星驰电影所一直保有的草根情怀。影片中到底层小人物忍辱与奋斗的表现显而易见,也有对草根阶层悲悯爱情表现,这些都是对周星驰电影的延续。不同的是,影片将焦点对准了内地“群演”这一特殊群体,如此选择既避开了周星驰不熟悉的内地市民的常规生活表现,又以周星驰所熟悉的演艺圈生活为切入点,带出了相关的丰富多样的内地市井民生。如内地到处可见的广场舞,被疑似“碰瓷”的车祸,充满怨气的父亲,理解女儿但又忧心忡忡的妈妈等等;还有那些骂骂咧咧的剧组场务,以及千千万万个和如梦一样的“群演”,他们各有所长,能表演出复杂而真实的人生百态,又必须面对残酷无比的竞争,但更多的时候无人问津。这些丰富多样的内地草根生态,通过“群演”这条叙事主轴被周星驰搬上了银幕,表现出了和经典周星驰电影中同样的本土化生活气质,较好地凸显出草根情怀。

其次,影片中同样具备了经典周星驰电影中的无厘头风格。按照有关喜剧理论,无厘头通常利用剧情反转达到意想不到的喜剧效果。这其中,需要进行精心的桥段设计和渲染,先让观众陷入他习惯性认知的剧情逻辑中,然后再通过反转,使剧情结果与观众的习惯性认知产生较大的反差甚至完全相反,因此产生喜剧效果。而解构传统、解构经典通常是周星驰电影中产生反转、获得无厘头品格的主要途径。由此,影片设置了解构传统、解构经典的两种路径:第一条路径为常规的经典周星驰电影中的直接解构。比如在影片开场的“车祸”中,如梦为受伤老人“指导碰瓷技巧”,如梦头上顶着把道具刀特别血腥地给父亲祝寿,以及随后如梦以踩脚的方式示范“痛苦”的多场戏,都是直接解构如梦所理解的经典意义上的真实表演。而这几场戏的最终戏剧结果与观众预期的结果反差较大,甚至是完全相反,产生较强的喜剧效果,同时也反讽了主人公如梦所追求的所谓真实表演。片中还有多个桥段以反差来营造喜剧效果,如不想当明星的小米却被星探看中;想跑龙套的“富二代”李洋,却要回去继承家业等等。此外,片中过气明星马可多次对“白雪公主”IP进行解构,还以香肠和一副球鞋染成的“腰子”来解构“盘肠大战”等经典的香港电影中的暴力美学元素。这些

都是周星驰电影中常规使用的解构手段,让观众看到在《新喜剧之王》中依然有经典的无厘头存在。

该片的第二种解构路径则完全不同于第一种的经典手法。尽管周星驰电影中的解构,是建构传统价值观的手段,但有时在某种直接解构如果放在香港本土的市井民俗中,亦或是植入以高科技手段营造出的奇幻世界中并不存在问题;但如果将这些直接解构面对当下内地真实的生活现状、置身不同于香港的内地电影文化之中,可能就会与内地现实社会中的主流价值观相悖,与内地电影文化不兼容。因此,放置于现实的内地,某些直接性的解构需要变通,这也是周星驰电影之于当下所面临的最大困境之一。

为此,《新喜剧之王》尝试走出了第二种解构路径,这种路径不直接解构,而是在遵从内地主流价值观基础上的深层次解构,是一种骨子里营造无厘头的解构。其中合约男友查理这条叙事线就显示了如此的解构。查理本是“渣男”,对如梦全都是逢场作戏的欺骗,但影片在前面的情节却没有点出,甚至又一次当如梦失望而归时,合约男友竟然弹着吉他深情地给她唱《分分钟需要你》,这个桥段看似全片最暖的一幕,没有任何不良的暗示。但不久之后便是雨夜中查理合约男友身份的暴露,最暖的一幕变得如此悲凉,甚至冷入骨髓。这样的桥段设计既反讽了道德欺骗,与主流价值观并不违和,但骨子里却是一种对所谓真情的解构,最温暖的竟是最残忍的。

此外,片中如梦的最终成功的桥段也似乎是变相的结构,她在历经羞辱与坎坷后无意再从事表演,回到父母身边开始了平静的生活,但却突然海选晋级且“银海封后”,意外成功。这其中的确饱含对小人物艰辛奋斗的褒扬,展示一种和主流价值观相通的励志,但其骨子里又何尝不是对命运的解构和对影视圈的某种反讽。可见,其第二条解构路径是和主流价值观相通的解构,是一种符合内地电影文化的高超解构;同时,其也吻合周星驰“解构是为了建构传统价值观”的创作主旨。

尽管进行了诸多的美学努力,但由于离开了香港市井民俗和生活气质的依托,又没有奇幻空间的支撑,特别是看不见了周星驰本人的表演,《新喜剧之王》最终的呈现效果似乎未达到观众的预期。另一方面,努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困境有所突破,但距离真正的创新还相距甚远。周星驰电影在上世纪末逐渐成熟铸成了经典,新世纪之后又将奇幻类型融入其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创新。如今,其放下奇幻试图再次回归经典,但这次的回归仅仅是一次在困境中艰难挣扎的创作,没有给观众带来什么新奇,原来的经典也被丢弃了很多。尽管如此,观众依然期待他的新作,希望还能看到那个令人欣喜的周星驰。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所长,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秘书长,研究员)

《廉政风云》： “港味”电影的突破试验

左衡

2019春节档有两部影片为香港电影人作品,一是周星驰的《新喜剧之王》,二是麦兆辉庄文强再度联手的《廉政风云》(下称《廉》)。从剧情、背景环境、主演人员、主创团队、制作出品等各个方面来看,前者显现出与内地电影产业高度融合的趋势,后者则保持了传统香港电影的纯度。两部影片的市场表现差别明显,前者一度是春节档大热门,后者成绩平平,传播度也较低。

不过我们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香港电影必须与内地电影产业完全融合才会有出路,更不能认为香港电影创作者需要刻意迎合某种不确定的内地观众趣味。时光网1月28日发文,报道了麦、庄在知乎就香港电影的“港味”发表的观点。他们指出,2018年国庆档庄文强导演的《无双》非常受欢迎。这意味着,如果香港电影人能找到某种路径,那么港片仍然可以获得观众的认可。然而,港味面貌究竟如何、又是否被大众明确意识到,在港片影迷那里一直是近乎玄学的问题。对港片黄金时代的痴迷,同对港片低谷期的失望,纠缠成一种情结。问题的答案也不尽在电影语言层面,而是要从社会、文化心理的角度去慢慢解决了。

《廉》的故事,按照顺序来看,其实颇为传统和简单:1,陈敬慈和许植尧是自小一起成长的好友;2,成年后陈考入廉政公署,许进了会计事务所;3,许在工作中发现权势集团勾结政府人员建立了规模惊人的香烟走私网络,向陈透露,陈私自将许发展为线人;4,许一方面收集到相当资料后向廉政公署举报企业行贿官员;5,另一方面则将巨额不法经费转账到金融网络里;6,在出庭作证的当天逃亡澳大利亚;7,陈的妻子、廉署谈判专家江雪儿受命前去保护并劝其返港;8,犯罪集团开始销赃灭迹,杀人灭口;9,陈不按规矩地不断反击;10,廉政公署仍处于被动;11,在开庭最后期限到来时,许突然向廉署申明自己的线人身份,从而失去了依法作证的资格;12,陈不得不引咎辞职;13,他发现自己其实被许欺骗利用,帮助许在廉政公署的内部网络中暂时隐藏起了那笔巨款;14,许把一部分钱款转给小时候住过的儿童医院;15,同时安排另一身患绝症的老友做替死鬼,帮自己逃过犯罪集团的追杀;16,然后隐姓埋名;17,影片结尾,许在和家人尽享天伦之乐时跌入泳池,自小缠身的心脏病发作。

到了影片叙述里,这些情节出现的顺序变为:6、7、8、9(第一大段落)-1、2、3、4(第二大段落)-10(非重要支线)-5(重要伏笔而未正面表现)-11、12、13、14、15、16、17(第三大段落)。这还只是笔者归纳的大体情况,如果将剧情中的细枝末节一一列出,会发现更多错综复杂的叙事设计,如情节15,其实有两位老友被许召集来帮忙,他们的形象或信息还隐约出

现在1、7、8、9、10、13多处。插叙、补叙,这些手法原本常见,特别是在犯罪、悬疑等类型中。对有经验的观众来说,他们观影的乐趣正在于身处知道和不知道之间的猜疑与推测、证实或落空,如同与创作者玩一场比拼智力的游戏。在电影文化高度成熟的今天,这会导致一种不很有趣的困局,创作者叙事的目的并非以“情理之中”为基点,反倒以“意料之外”为目的,仿佛不被观众猜到谜底才最重要,以至于,很多谜面式的信息,都被故意延宕到最后才交代,这就克扣了观众反应和猜谜的时间。

在时间分配方面,影片开头用了10分钟左右,将基本案情和两位主角交代完毕;接下来又用5分钟左右,转而交代陈江夫妻的工作关系与感情危机。这两段落对主线、辅线的处理完全遵循剧情片的惯常模式,虽不出彩,但中规中矩。接下来常见的——或者说更符合认知规律的——做法,是将主、辅线进行缝合,比如,在陈江关系里,“性别歧视”一开始就成为矛盾冲突,这一般会在后边特别是高潮部分进入陈许线索,实现某种重要的剧情功能。然而,影片接下来的发展再次抛弃了常规,进入非常错综复杂的案情交代,不断加入的人物和细节让观众不得不集中注意力去整理信息,无暇顾及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这样一直持续到影片的1小时15分左右,剧情走向转折点,各线索开始汇聚时,突然转头交代各种前情和背景,许的人物设定迅速黑化,陈也进入灰色地带。至此,观众前面建立起来的心理期待基本破灭了,在接受欣赏叙事艺术的立场上,这种冒险手段很难成功,也对观众不友好。整个过程中,性别歧视的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倒随着江的行动得到实质上的印证,因为她在这场智力游戏中始终处于被动、被利用的境地,直到最后用对男性撒娇的方式收场。

影片讲授知识太多,是影响观众感受的又一弱点。廉政公署、香港司法、高层犯罪、网络金融等都得到了相当充分的解说,例如近几年引起世界股市市场震荡的比特币交易模式。除非观众事先对这些领域有一些了解,否则理解起来会吃力,同时也未必感到兴趣。在主流类型片里,编剧堆砌太多专业知识是大忌。

视听语言也没有好的办法来帮助上面几个问题。对话过多,中近景为主,注重人物着装发型的时尚感,这些做法都令人联想到港剧。片中人物面部特写很多,其中,方中信饰演的廉署高级官员因为特写镜头时值较长而格外突出。他大多时候坐在与大家隔离的玻璃办公室里,又用办公桌和电脑屏做了空间二次分割,这些手法叠加起来,不免给观众造成过多联想,以为后边会有人设的转向,而最后似乎只是一个单纯无所指的特写。音乐用得太多太响,举凡情节要点和情绪要点都一定有背景音乐,强力把观众拉近

某种情绪情调,这从反向说明,影像叙事和表情其实不到位。

似乎是为了增添调剂,影片的配角大都造型抢眼、表演抢眼。陈有一男一女年轻下属,妆容精致,但在剧情里的基本功能就是在犯错、跑腿、发现疑点。陈的同事文仔,捏合了取场丑角和天才侦探的功能,不但如此,剧情还在很晚的时候才忽然交代出他是陈许的旧日同窗!这种虽然出乎意料、实则并无必要的巧合还出现在许召集的二老友帮手身上,观众和陈一起错愕地发现,原来他们四个人在小时候就曾一同玩耍!至于当下观众对这些巧合是否信服,有必要做下调研。

以麦、庄二位的实力,很难想象他们会不知道类型片的规律或者套路,也不应质疑他们的视听语言能力。因此,笔者更愿意相信,这部影片是出于有意为之的目的。更具体地说,结合麦、庄以及多位香港电影人近年的创作动向,这部影片的改变或者可以看作是陈许对陈故事和新叙事的一次试验。

首先,是试图超越类型的努力。类型之所以成立,其背后是由叙事模式、审美趣味、价值判断标准和世界观等共同组成的一种文化结构。港片近年来的困境,恰恰在于其原有的结构不再适应世界变迁的新格局。对此有所领悟的电影人自然会寻找新的出路,这个进程中的成败得失都不足为奇。《红海行动》的成功得力于将香港动作片的英雄情结和视听奇观升级到国家民族层面,《无双》的成功来自国际高科技犯罪的奇观折射人性的聪明和善恶,两片都有很好的平衡感。《廉》的失利恐怕是因为它在深度内容发掘和外表现形式之间尚未达到良好平衡。

其次,也是走向现实关注、显露现实焦虑的结果。在笔者第二次观看以求解决剧情理解疑问时,强烈地感到主创的认真和勇气。在近年香港警匪片里,打击毒品是常用的题材,《廉》则发现了与日常生活相关、因而更庞大更强悍的黑暗势力。香港地区自2009年开始征收高额烟税,此事件在隔年香港影片《志明与春娇》中是一段恋情故事的背景,十年后则是事关地方廉政、需要付出生命代价的大事件了。《廉》沿用香港警匪片常见的双雄形象,但他们面对的,却已经是黑白交织的犯罪行为与机制死角,当程序的正义性遥遥无期,手段的极端化只能走上绝路。感觉到这种现实里无所适从的焦虑,才能更好地理解《廉》叙事上的失措。那些艺术上不协和音,在现实中竟有回响。单凭《廉》在现实关注上选点之准,已足以为其商业上的失利做一有瑕辩护了。

只是不知,这样的辩护是否是一次误读?答案可能要看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版本是否为叙事的原初设定、以及是否有续作了。

(作者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文化研究室副主任)

